第一章　全国性抗战爆发，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1 月上旬）

第一节　　全国性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全面侵华战争，蓄谋已久。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就逐步推行以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雄世界为战略目标的“大陆政策”。同时，相继侵占中国的台湾、澎湖、旅顺和大连等沿海岛屿和城市，与侵占的朝鲜半岛、琉球群岛构成一个月牙形的半包围中国的态势，建立起入侵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的东方会议，并在会后写成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第 2 页。支那，即中国）从而，使“大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变为扩张的实际步骤。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北大营附近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条湖地区，炸毁南满铁路，进攻中国驻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绝对“不予抵抗”政策(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4月版，第236页)，日本帝国主义得以2万余人的军队，在短短的4个多月里，就侵占了中国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这主要是与其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分不开的。

从日本国内来看，经济危机空前加剧。1927年，陷入了金融危机。1929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发生了全面的经济危机。1931年，经济危机恶化到顶点，工业生产下降32.5%。到1937年，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日本物价飞涨，一些工厂企业倒闭，大批工人生活日益贫困，外贸收支逆差增大，债台高筑，黄金大量外流，仅上半年达2.7亿元。

频繁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尖锐的政治危机。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广大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内政局动荡不安。1931年至1937年，就更迭7次政府内阁。

从日本的对外关系来看，尤其是对华正常关系，由于其奉行侵略战争政策，因而陷入严重危机。这一切情况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当时，中国自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虽出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但全国性抗战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也有空隙可入。为了摆脱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危机，并在英、美等国绥靖政策的

纵容和支持下，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日渐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和步伐。

在军事上，大力进行扩军备战。仅陆军总兵力，由 1931 年的 23 万人发展到 1937 年的 40 万人。1937 年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开支中，占 49%。1936 年 8 月，制定了 1937 年度全面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对华北，除过去的两个军（5 个师团）外，再增加 3 个师团，在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以第 9 军（3 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调新编第 10 军（2 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大致用 1 个师团的兵力。

在政治上，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尤其是 1936 年“二·二六”军事政变，正式建立了以军部为主体的法西斯统治体制，确立了进一步推行战争政策的组织基础。

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以军需为主体的重工业，大力扩建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大型企业，吸引新老经济财阀增加在军需方面的投资比重，促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

在思想上，以青年学生和士兵为主要对象，加紧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扩张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强化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中国本部进逼。1933 年 1 月，突破山海关，开始入侵华北。2 月侵占热河，3 月进攻长城各口，5 月侵占冀、察（哈尔）东部地区。1935 年 6 月，获得冀察两省大部主权。接着，策划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察

哈尔和绥远在内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建立第 2 个伪满洲国。11 月，建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 年 2 月，建立伪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在外长顾伟钧举行宣誓就职时讲演，1931 年 11 月 30 日）反动政策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扶植伪政权的阴谋，连连得逞，华北殖民化的危机日趋严重。一场全面侵华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1937 年 7 月初，在东京军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盛传“7 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第 12 页）

果然，日本帝国主义于 7 月 7 日夜，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地区，以军事演习为名，谎称一名士兵失踪，借口向中国驻军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第 29 军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及其战略防御阶段。

“七·七”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包括平、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兵一部，于 8 月 13 日，袭击上海中国守军后，进而入侵包括淞沪在内的华中地区，遭到中国军队抵抗，制造了“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风云，空前地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全国性抗战的局面蔚为壮观。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坚决抗战。在“七·七”事变的第 2 天，即 7 月 8 日，遂向全国各团体、军队和国民党及其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全国同胞，发布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以下简称《通电》），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

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致电蒋介石,坚决要求请缨杀敌,郑重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9 日,彭德怀等 9 名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发布《通电》,重申:“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二十九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严正立场和抗战意志。

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表现出和战举棋不定的抗战两面性。一方面,调兵遣将,对抗日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暗示地方政府和驻军,即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 29 军宋哲元部与日军和谈,幻想作为局部事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周恩来于 7 月中旬到达庐山,于 15 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 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愉快生活。《宣言》郑重表示:在上述总目标下,愿与全国同胞携手一致地努力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苏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待命出动,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以“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周恩来选集》上卷，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76 至第 78 页）

在中共中央的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于 7 月 17 日发表庐山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同时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战”，“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构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严重危害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和英、美在华权益，从而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政策，进一步好转。 8 月 14 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9 月中旬，中共中央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为代表，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和发表问题，与蒋介石、康泽等人举行会谈，终于 21 日达成协议。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的上述《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

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谈话》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既摒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对于实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抗战高潮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业者和各民主党派及台湾、港澳同胞、海外爱国侨胞，都以未曾有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其参加的阶层和党派之多，地区之广，规模之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台湾到大陆，从东北到关内，从内地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从来没有像全国抗战这样，把人民动员得如此广泛，教育得又如此深刻。中华民族犹如被激怒的雄狮，已经苏醒了。斗争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一个永远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033 页）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由于所处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竭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英、美等国深感日本独占中国，会损害其在华权益，希望日本北进苏联，避免直接与日本对抗。因此，既同情、支援中国抗战，又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继续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谋求与日本妥协。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二、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实现全国性抗战和倡导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并针对国民党政府主张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依赖外援，而不愿依靠、动员、组织、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多线设防，节节抵抗，在持久消耗作战中，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求得战胜敌人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全国抗战必须采取的积极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7月8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7月23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严正表示：“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8月上旬，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其要点是：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地把日军从中国赶出去；在

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战略的内线防御，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在敌人前后左右，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以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为了正式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周昆、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国焘、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和傅钟，共 23 人。另李富春担任会议记录。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军事问题主要是战略问题。日军进攻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地区不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面，是辅助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点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战争，依托比较好。什么叫游击战？即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一是我们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二是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设立红军总指挥部，不让国民党插手我军；三是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等。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

动提纲。《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决定》同时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21、322页）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全国抗战以来，第一次以党的决定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议通过的《宣传提纲》，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形势和任务的主张，而且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华北、收复平津和东北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参加抗战，共同抗日；改革政治机构，民主选举

国防政府，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并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廉洁政府；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同盟和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包括联合日本国内人民；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禁绝日货；改良人民生活，即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变旧制度、旧课程为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实行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和徐向前组成，共 11 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确定了全国抗战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对于坚持长期战、争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持久战战略方针问题，洛川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敌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于 1938 年 5 月，在著名的《论持久战》讲演中，令人信服地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科学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所经过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论述了一整套进行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阐明了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实质是经过长期抗日战，实行持久的人民战争，逐步改变中日力量对比，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之目的，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而，使持久战这一战略方针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显而易见，共产党在形成持久战战略方针过程中，具有倡导和促进作用；但持久战正式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也是与处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所接受和认可分不开的。应该说，全国抗战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确立，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节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

一、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红军改编，是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等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五次谈判，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企图通过谈判来削弱、限制，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而使红军改编问题进展缓慢。

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多次作出重大让步，主动提出红军改变名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等。然而，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将红军人数限定在 3 万人，并且不能设总指挥部，由他们派人担任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对此，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红军改编为 3 个师，人数须在 4 万人以上，在 3 个师以上要设立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人到红军中任职，并增加红军的防地等。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急需红军出师抗战，红军的改编问题始获解决。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 10 项条件。其中，关于红军改编的内容是：须使红军放在合法地位，早日开赴前线杀敌；同意设立指挥部；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一部分在陕西三原地区补充，另一部分在山西太原补充；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依据游击战争原则，出兵与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陕西韩城渡河前进；红军第一批出动地区，在平汉铁路线以西，平绥铁路线以南地区。同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改编原则等问题。 8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红军改编问题的协议。

当时，红一、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等部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是：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杨尚昆）辖第 1、第 15 军团和特务团、骑兵第 2 团，总部驻陕西云阳地区。第 1 军团，代理军团长陈光，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辖第 1 师（师长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第

2师（师长黄永胜，政治委员肖华）、第 4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杨勇）和骑兵第 2 团及随营学校，全军团共 10 个团，1.1 万人，有 6000 支枪，部队驻甘肃正宁、宁县和陕西枸邑地区。第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蓝国清，政治部主任王首道，辖第 73 师（师长赵凌波，政治委员陈漫远）、第 75 师（师长韦杰，政治委员刘幼安）、第 78 师（师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崔田民）和教导营、特务营，全军团共 8 个团另 2 个营，8000 人，有 4800 支枪，部队驻陕西未城驿、百关、孟坝地区。特务团，5000 人，有 1200 支枪。红一方面军共 2.4 万人，有 1.2 万支枪。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甘泗淇，辖第 2、第 6 军团和第 32 军及骑兵第 1 团等。第 2 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辖第 4 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李井泉）、第 6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共 5个团，约 4500人，有 2800 支枪。第 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辖 4 个团，共 3500人，有 3500支枪。第 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约 3个团，共 2000 人，有 2000 支枪。红二方面军直属队 1500 人，有 600 支枪。全方面军共 1.15 万人，有 8900 支枪。部队驻陕西耀县地区。

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宋任穷，辖第 4、第 28、第 31 军和骑兵第 3团等。第 4 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 10 师（师长陈锡联，政治委员叶道志）、第 12师

(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和教导团,共 7个团,6000 人,有 3600 支枪。第 28 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共 3个团,有 1500 人,900 支枪。第 31 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郭述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 91 师(师长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第 93 师(师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叶成焕)和特务团,共 7个团,8000 人,有 4800 支枪。全方面军共 1.55 万人,有 9300 支枪。部队驻陕甘边地区。

另驻陕北红军有第 27 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全军共 1101 人,有 628 支枪;第 29 军,军长谢嵩、政治委员甘渭汉,全军共 928 人,有 491 支枪;第 30 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杜平,全军共 822 人,有 495 支枪;独立第 1师,师长白志文,政治委员张达志,全师共 814 人,有 532 支枪;独立第 2 师,师长王兆相,政治委员王保山,全师共 1400 人,有 350 支枪;第 74 师,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张明先,全师共 2000 人,有 900 支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地方部队等。主力红军共 74404 人,有 40584 支枪。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 8 月 25 日宣布命令:“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 3 个师:第 115 师由红一方面军第 1、第 15 军团和陕北红军第 74 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全师共 1.55 万人;第 120 师由红二方面军第 2、第 6 军团,第 32 军和陕北红军第 27、第 28 军等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全

师共 1.4 万人；第 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第 4、第 31 军和陕北红军第 29、第 30 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全师共 1.3 万人。另总部直属队共 3000 余人。八路军共 4.6 万人。

与此同时，八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和兵站部成立，赵尔陆、姜齐贤、杨立三分别任各部部长。第 115 师第 343 旅，由红一方面军第 1 军团第 1、第 2、第 4 师编成，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辖第 685 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邓华）和第 686 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 344 旅，由红军第 15 军团第 73、第 75、第 78 师编成，旅长徐海东，辖第 687 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和第 688 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教导队，队长韦国清；骑兵营由骑兵第 2 团改编；炮兵营和辎重营由红军第 74 师改编。

第 120 师第 358 旅，由红二方面军第 2 军团第 4、第 6 师和第 28军编成，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 715 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赖星云）和第 716 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第 359 旅由第 6 军团、第 32 军及前总特务团第 1 营编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 717 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和第 718 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炮兵营和辎重营由第 27 军及赤水警卫营改编；骑兵营由骑兵第 1 团改编；特务营由独立第 1 师和陕北独立团改编；工兵营由独立第 2 师改编。

第129 师第 385旅，由红四方面军第 4 军第 10、第 12 师编成，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辖第 769 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和第770 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 386 旅，由红军第31 军第 91、第 93师编成，旅长陈赓，副旅长陈

再道，辖第 771 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和第 772 团（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骑兵营由骑兵第 3 团改编；特务营，由第 29 军改编；工兵营，由第 30 军改编；炮兵营和辎重营，由陕甘宁边红军独立第 1、第 2、第 3、第 4 团改编。

为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在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下设东、西两个地区留守处。东地区留守处，主任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指挥第 115 师炮兵营、辎重营，第 120 师第 718 团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留守府谷、神木、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西地区留守处，主任王宏坤，副主任王维舟，指挥第 129 师第 385 旅旅部、第 770 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等，留守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等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担负着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保卫陕甘宁边区，协同地方保安部队肃清土匪，发动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及扩大与训练新战士、补充主力部队的重要任务。

12 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正式改称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辖警备第 1 团，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钟汉华；警备第 2 团，团长周球保，政治委员甘渭汉；警备第 3 团，团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杜平；警备第 4 团，团长陈先瑞，政治委员刘国桢；警备第 5 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李宗贵 警备第 6 团，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张达志；警备第 7 团，团长尹国赤，政治委员刘随春；警备第 8 团，团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帅荣；第 770 团，团长张才千，政治委员肖元礼；绥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